

王国维学术思想研究

张其成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国维学术思想研究

张志建 薛载斌 著
张 暄 丁秀琴

教育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111号

责任编辑:徐 同

封面设计:李葆芬

王国维学术思想研究

主编 张志建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46号)

兴城市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25,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册(精装)

ISBN 7-5041-0991-6/G·948 定价:7.00元(精装)

前 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出身于浙江海宁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其高祖、祖父均为清代国学生，其父王乃誉虽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弃儒经商，但仍保存着对诗文书画篆刻的爱好，这给王国维以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受过封建传统教育，并于1893和1897年两度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考取。1898年去上海，在梁启超、汪康年创办的《时务报》社任书记、校对。因受当时维新变法影响，毅然决定“弃帖括而不为，绝举业而不就”。在《时务报》停刊后，就任罗振玉创办的《东方学社》的庶务，学监。这时他除了学习日文外，还跟《东方学社》的日本教师田冈和藤田学习日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1900年《东方学社》停办，他就去日本进东京物理学校学习。1902年因病回上海，在罗振玉任校长的南洋公学虹口分校工作，并为《农学报》和《教育世界》杂志撰文。1903年和1904年他先后任南通师范学校和苏州师范学校的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教员，读了不少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和哲学书籍。特别从这时开始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书籍，曾先后四次研究康德哲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他停止对哲学研究，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专门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刊行了《曲录》、《人间词乙稿》，1910年写成《人间词话》，1912年写成《宋元戏曲史》，从此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但不久又中止对文学研究，把精力转向考古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和罗振玉因为是保皇派，尽忠清王室，惧罹罪，就逃往日本京都，直到1916年回国。从1913年起从

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尤对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考释，先后编写了《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文章，当他看到英国人哈同的《殷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和罗振玉新拓的书契文字后，又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从而对殷虚书契考证作出了成绩，这也是对我国古代史研究作出的贡献。1922年他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年被清宫小朝廷任命为“南书房行走”。1925年被任命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他不就职，只任教授。这时他不仅研究西北地理和元史，而且也讲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仪礼》等。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据不完全统计，其著述达62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达42种，还有些考证文章收入《观堂集林》。手校手批的书籍达192种。他的学术活动时间，虽然仅仅25年，但在哲学、教育、诗学和史学研究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在史学研究上，郭沫若同志认为，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但由于他以清王室遗老自居，政治思想保守，故长期不被重视，很少人对其学术思想进行研究。近十年来，研究王国维学术思想较为活跃，发表了不少有价值、有见解的著作和论文，特别是《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的出版和“国际王国维学术研究会”的召开，为开展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本《王国维学术思想研究》就在这个条件下，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的，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只是引玉之砖，很粗糙，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1年10月

目 录

哲 学 篇

第一章 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	(1)
第一节 介绍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	(3)
第二节 对《论性》、《释理》、《原命》的剖析.....	(10)
第三节 主张开设哲学科.....	(23)
第二章 “无我”的伦理思想	(25)
第一节 对封建伦理思想的批判.....	(30)
第二节 “自由”和“解脱”	(36)
第三节 “人是目的”和“无生”	(43)

教 育 篇

第三章 “精神慰藉”的教育思想	(50)
第一节 对封建教育思想的批判.....	(51)
第二节 使人明确宇宙人生之大事的教育思想.....	(56)
第三节 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	(60)
第四章 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74)
第一节 主张直观和理论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74)
第二节 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民主的主张.....	(77)
第三节 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80)

诗 学 篇

第五章 转治诗学的理论价值和创作实践	(85)
第一节 诗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85)

第二节	《人间词》的创作实践	(82)
第六章	前期杂文中的几种诗论	(106)
第一节	“超功利”的美的本质论	(109)
第二节	“古雅”——艺术形式美思想	(119)
第三节	王国维的美育思想	(134)
第四节	王国维的悲剧思想——《红楼梦评论》	(138)
第七章	《人间词话》与境界说	(154)
第一节	“境界”之辨	(155)
第二节	“造境写境”之辨、“主客观诗人”之辨	(163)
第三节	“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辨	(173)

史 学 篇

第八章	转治史学的首要成果	(178)
第一节	转治史学	(179)
第二节	戏剧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184)
第九章	硕果累累的史学成就	(191)
第一节	从《流沙坠简》到敦煌学的研究	(191)
第二节	对甲骨学与殷周史的突出贡献	(198)
第三节	金石学研究之贡献	(208)
第四节	西北地理与民族史研究之贡献	(212)
第五节	目录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研究之成就	(226)
第十章	王国维史学思想简析	(232)
附录:		
王国维年谱		(236)
王国维主要论文、主要著作和手校手批古籍书目		(255)
研究王国维主要论文和著作书目		(272)

哲 学 篇

第一章 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

王国维虽然很早就对哲学发生了兴趣，但正式研究哲学，还是从1902年开始，到1907年倦于哲学而转治文学为止，前后共六年时间。在这六年中，他刻苦地研究哲学，不仅攻读了许多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而且攻读了许多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尤其下苦功夫研究了康德和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在这六年中，他不仅先后在南通师范学校、苏州师范学校从事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的教学工作，而且在当时的《教育世界》、《广益丛报》和《政艺通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哲学论文和几十首具有哲理性的诗词。1905年，他又亲自对这些论文和诗词作了整理，出版了《静安文集》。

王国维在当时这样单一地研究哲学，并且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绩，这不能不是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贡献。其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把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最早介绍到中国来。向西方寻找真理，这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潮流，因为当时有识之士感到中国学术要不被封建主义气息所窒息，就必须更多地吸取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于是，严复向西方找到了实证论哲学，王国维向西方找到了康德、叔本华哲学，而梁启超是兼容并包，既赞成实证论哲学，又称颂康德哲学，在介绍西方学术方面，王国维不仅是介绍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而且很有自己独特的见

解，1905年他所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就主张反对学术界的闭关自守，反对不吸收西方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当时他认为学术争论，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不能掺杂国家、人种、宗教的意见。但可以用外国的知识来补偿中国不足之处，或用来解决自己的怀疑。同时他还主张哲学神圣，哲学要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主张吸收西方的哲学思想来“感动”中国的思想界，无疑这些主张是对封建王朝的学术专制的反对和破坏，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第二，他主张用西方哲学来解析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性、理、命的问题，同时也主张用中国哲学来解析外国哲学史的争论问题。这种用中西对比来研究中西哲学的新方法，是值得称颂的。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还说：“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种“学无中西”的观点也是值得称颂的，这比当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要进步。自从1840年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之后，中外哲学相互产生了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很少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所以不了解西方哲学，也就很难了解中国近代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不难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要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作对比地研究，这种对比研究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很宝贵的经验。

第三，王国维批判其顶头上司张之洞不重视哲学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经学科文学科章程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不仅是我国现代文科大学的雏型，而且这种把哲学概论、哲学史、心理学等哲学课程作为学习文科各科的基础，是符合当时学校发展要求的，王国维在这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贡献。

但是就王国维自身的哲学观点来说，却是在深受叔本华影响之后而形成了自己的悲观主义哲学观点，这个观点影响了他的一

生，甚至最后葬送了他的生命。

下面我们就以王国维的悲观主义哲学观点作为线索，从以上三方面对王国维的哲学思想加以剖析。

第一节 介绍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

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说：“王氏之贡献最大在于学术，而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的贡献，一是早年西洋哲学思想之介绍，一是‘甲骨文’介绍德国思想到中国来，最早，但影响最大的，就是王国维氏。”很明显，王国维在中国哲学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他继严复介绍西学到中国来后，第一个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康德、叔本华等人的哲学思想。他的大部分哲学论文，如《汗德像赞》（汗德即康德——编者注）、《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论性》、《释理》、《原命》、《红楼梦评论》等都是系统介绍康德和叔本华思想的。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所以是悲观主义的，是和这一点分不开的。

康德是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我们意识之外，有一个“自在之物”的物质世界，一方面又认为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东西。他认为人们的理性只能认识此岸的现象，不能认识彼岸的事物。所以他在哲学史上是个二元论者。

叔本华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作有《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论自然中的意志》等。他以康德继承人自居，继承了康德的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哲学，而摒弃了康德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他认为世界的本体就是世界意志，自然界和社会发展没有什么规律性，完全受盲目的意

所宰。他认为，人的主体是意志的客观化，身体的各部分是同意志的欲求相对应而存在的。有食欲才有齿，食道和胃的存在，有生殖欲才有生殖器的存在。要吃捕获物的野兽，就需要发展爪牙和体力，冲撞的欲望是动物有角的原因。植物渴望日光，所以向上生长，渴望潮湿，所以向土壤里扎根。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意志的表现。求生的欲望，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叔本华所谓的“生存意志”的东西。“生存意志”支配一切，一切的物质本质都是意志的表现。宇宙受意志的支配，意志表现为欲望。而欲望是常常得不到满足的，当人类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所以意志是永无止境的苦难源泉。他认为人生免除痛苦，只有寂灭主观意志的欲求。从康德的先验论引向唯意志论，又从唯意志论引向个人唯心主义的悲观主义。这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按照王国维研究哲学的目的，是比较容易接受康德哲学思想的。他说：自“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①他所说的人生问题，主要是政治道路问题。当时王国维政治思想是很复杂的。他出身在封建地主家庭，受过封建传统教育，同时又受着封建保守的罗振玉的影响，因此也有保守思想的一面。但当时他毕竟是年轻人，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很大，而且又学习了日文、英文和自然科学，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所以主流还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这种矛盾的政治思想，给他选择政治道路带来了复杂性。当时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向发展，也有不少向封建保守方向发展。王国维是看到这一点的，继续坚持康梁的维新变法道路是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前进，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向发展，不仅罗振玉不同意，

① 《自序》，《王国维遗书》第5册

而且自己也没有这个勇气。但这个时候，马上向封建保守方向发展，他也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时候在政治道路上徘徊着、苦闷着。康德二元论的哲学思想是和他这个人生问题相一致的。当他第一次从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那里看到康德著作，就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三十自序》一文中，详细叙述他与康德、叔本华哲学接触的经过。早在1898年，他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东文社学习时，就在哲学启蒙教师——日本的藤田丰八和田冈佐代治那里接触到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特别当他看到田冈先生文集中有引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段落时，就对康德和叔本华哲学发生了兴趣。

1902年夏，他因病从日本回国，为了找到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开始研究康德、叔本华哲学。在他《三十自序》一文中叙说了他研究的经过。“癸卯（1903年）春，始读汗德之《纯粹理性批判》，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倾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王国维所说的“苦其不可解读”，是指他读《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第一编《先验分析论》时，差不多全部都不能理解。正当他对晦涩难懂的康德哲学著作读不下去、陷入苦闷烦恼无以自拔的时候，一接触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马上就心旷神怡，“获得无限的自我慰藉”，只好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了。但他是个顽强的人，他不甘心读不懂康德哲学著作就此罢休。1905年，他在苏州师范学校教书时，在他读了叔本华著作以后，又重读了康德著作，并决心在此后数年内专力研究哲学，“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得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这次，他觉得不像前年那样读不懂。因此除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以外，兼读康德的伦理学和美学著作。这主要是由叔本华著作帮助的结果。这在他《三十自序》一文中也讲得很清

楚，他说：“次年（1903），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即《纯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以后第三、四次再读康德哲学就更容易理解了。他说：“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更少，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1907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之处，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恃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处而已。”①在他研读康德书的同时还读了弗尔班克斯的《社会学》、杰文斯的《逻辑学》、保尔逊的《哲学概论》、海甫定的《心理学》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等书，这也都有利于他对康德哲学的研究。

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研究，引起了他对康德的崇拜，不仅写了一系列介绍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文章，还在《汗德像赞》中说：“人之最灵，厥维天官。外以接物，内用反观。小知间间，敝帚是享。群言淆乱，孰正其枉？大疑浑浑，是粪是除。中道而反，丧其故居。骂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凡此数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匪言之艰，证之维艰。云霾解驳，秋山峨峨，亦日中天，烛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暗。谷可如陵，山可为藪。万岁千秋，公名不朽。”很显然，王国维在这里称康德像当空的太阳，把黑暗都驱除掉，像翱翔长空的风凰，使百鸟都鸣不出来。

虽然如此，王国维对康德哲学进行第四次研究时，还是认为

① 《自序》，《王国维遗书》第5册

康德哲学“大抵其说之不可恃者也”。这使他不得不“疲于哲学”，而转向文学。这在他《三十自序》中也讲得很清楚，“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文。经验论之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①从这里不难看出，王国维最早接触的西方哲学是康德哲学，但这个康德哲学已被叔本华曲解了，所以他虽然称颂康德，但最后还是要转向叔本华，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思想支配。王国维在文章中所说的“伟大之形而上学”是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叔本华的认识论；“高严之伦理学”是指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及叔本华的伦理学；“纯粹之美学”是指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及叔本华的美学。这些著作都是王国维所“酷嗜”的，他认为都是可爱的^②。但其中有“不可恃处”、“不可信处”，有谬误，而可信的实证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又不可爱。如何摆脱这种矛盾呢？只有放弃而不去研究它。

王国维从哲学转向文学，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感到研究哲学太难了，不能出成果。他说：“今日之哲学界，自赫尔德曼以后，未有敢立一家系统者也。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

① 以上引文见《王国维遗书》第5册《自序》。

② 参见陈元晖，《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

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家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①

王国维在这种矛盾支配下，30岁以后，截然与哲学分手，他的《三十自序》就是与哲学研究的“诀别书”。即使如此，在他以后研究文学、史学和考古学过程中也摆脱不了康德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影响，最后他的自杀就证明他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受害者。

《红楼梦评论》一文就是根据这种思想写成的。他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物多为人生男女之欲所痛苦。有的经受不了痛苦而自杀，如金钏之堕井，司棋之触墙，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有的经受不了痛苦而出家，如贾宝玉初尝男女之欲之痛苦，其后弃家为僧；惜春、紫鹃自己虽无此痛苦之阅历，而观察他人痛苦，亦皈依空门。所以：“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的悲剧也。”^②叔本华把悲剧造成的原因分成三种，第一种由于恶人作祟，第二种由于恶运之使然，第三种由于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此。王国维认为造成贾宝玉和林黛玉之悲剧属于第三种；他认为这种悲剧价值更高，因为第一、二种悲剧可以防止，可以幸免，而第三种悲剧的“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③所以王国维认为《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王国维用哲学思想评论《红楼梦》，虽然比以前红学家从索隐或考证上评论《红楼梦》要进步得多，但他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强加给这部世界名著，是很不合适的，也不符合《红楼

① 《自序》，《王国维遗书》第5册。

②③ 《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5册。

梦》作者本意。这只能表明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之深。

王国维的诗词也充满了悲观主义思想，樊志厚认为他的诗词“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①也就是说他的诗词有极深的人生哲理。他的人生哲理，实际上就是叔本华唯心主义的悲观主义。如《蚕》的最后一句“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拼飞》的最后一句“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书古书中故纸》的最后两句“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这些诗句，不用解释，就可知是充满悲观主义人生哲理的。

中国古诗词，含政治和伦理之意很多，但含哲理之意较少，王国维在自己诗词中，虽然融入的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但其词意立异标新，别开境界，为中国近代新诗词闯出了一条新路。所以王国维诗词虽然不多，但在清末民初时期是独树一帜的。

王国维当时不是偶像崇拜的盲目主义者，而是具有独立思考的追求真理的有作为的青年。就是在他受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影响很深的时候，还是对叔本华思想产生了许多怀疑。在《红楼梦评论》第四章中，他首先对叔本华哲学思想产生了怀疑，认为“叔氏之说，徒引据经典，非有理论的根据也”。^②在《叔本华遗传说后》一文中，王国维更是通篇举了中国历史上大量事例驳斥和反对叔本华本之说，他说：“叔氏所谓母之好尚及情欲，决不能传之于子者，吾人所不信也。”“其谓父之知力，不能遗传于子者，此尤与事实大反对者也。”1905年他在《静安文集》的自序中，对叔本华哲学思想终于下了结论：“旋悟叔氏之说，半

① 《人间词乙稿》序。

② 《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6册。

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客观的知识。”这说明他对叔本华之说是怀疑的。但他始终走在可爱而不可信的唯心主义和可信而不可爱的唯物主义的十字路口上，并且在两者中间徘徊着、苦闷着。后来，感到哲学实在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就把自己的嗜好从哲学移向文学，去求直接之慰藉了。

郭沫若同志说，王国维在文学方面志趣不中断的话，“照着他的理论和素养发展下去，他在文学上的建树必然更可观，而且说不定也能打破旧有的窠臼，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位先驱者”。^①假如王国维当时不中断哲学研究，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徘徊和苦闷几年以后，有可能成为康德的二元论者，也有可能和鲁迅一样成为唯物主义者。那么在哲学研究方面的建树也是可观的。

王国维最早最系统地把德国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和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学者，特别为同时代的蔡元培、鲁迅等进步学者研究德国哲学思想打下了基础，这一点是值得称颂和肯定的。

第二节 对《论性》、《释理》、 《原命》的剖析

王国维在30岁以后中断了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研究，但其受康德、叔本华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因此而形成的悲观主义人生观，过早地进入佛家的“涅槃”，归于寂灭。这一点不仅影响他的生命，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而且还影响他的事业，使他不得不半途而废，当然更是影响了他30岁以前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他所发表的《论性》、《释理》、《原命》三篇主要

^① 《鲁迅与王国维》，《历史人物》第213页。